

【国际政治前沿译丛】

丛书主编：俞可平



PEOPLE, STATE, AND FEAR

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人、国家与恐惧 ——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安全研究议程

【英】巴里·布赞 (Barry Buzan) / 著

闫健 李剑 /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国际政治前沿译丛】

丛书主编：俞可平

人、国家与恐惧

——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安全研究议程

【英】巴里·布赞 (Barry Buzan) / 著
闫 健 李 剑 /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01-2005-1344

People, State, and Fear

Barry Buzan

© 1991 Prentice Hall UK

This translation of People, State and Fear: 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Second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本书由简体中文版由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授权中央编译出版社在中国大陆独家出版发行。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国家与恐惧/(美)布赞著;闫健,李剑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11

(国际政治前沿译丛)

ISBN 978-7-5117-0078-0

I. ①人… II. ①布… ②闫… ③李… III. ①国家安全-研究 ②国际关系-研究
IV. ①D035.3 ②D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03822 号

人、国家与恐惧

出版人 和 龔

丛书执行 贾宇琰

责任编辑 贾宇琰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 (010)66509360(总编室) (010)66509350(编辑室)
(010)66161011(团购部) (010)66130345(网络销售)
(010)66509364(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下花园光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960 毫米 1/16

字 数 228 千字

印 张 24

版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9.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编者说明

改革开放过程，也是中国加入国际社会，并在其中发挥越来越大作用的过程。胡锦涛在总结改革开放 30 年经验的时候，把中国参与全球化作为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经验之一。他说：“当代中国的前途命运已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中国要为促进人类和平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贡献。

编选这套“国际政治前沿译丛”的初衷就是，希望能为日益国际化、全球化的中国提供更加多样的国际政治知识的支持和参考。这个想法产生于 2004 年初夏俞可平教授与一位在剑桥大学留学的中国学者的谈话。双方谈到了国内对于国外的国际政治著作的引介工作，都认为不应该只把目光集中在个别国家，特别是美国，应该注意到其他国家中关于国际政治的著作，这样才能了解到更多的观点、思想，才能有所比较，并且汲取百家之长。这位中国学者回到剑桥后，就联系了一些英国学者为我们推荐了一批他们认为富有价值的著作。当然，其中多部是“英国学派”的代表性著作。我们又根据当时国内已经翻译的国际政治著作的情况，从这些著作中挑选出一些。现在，这些著作

将陆续与读者见面。

尽管这些著作的论题不同，但有三个共同特点：首先，这些著作都具有很强的理论性。有学者认为，英国学派最大的理论特色是他们主张用历史、法律、哲学的方法来“阐释”国际政治，而不是用需求对国际政治进行“解释”。从这些著作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国际政治不仅仅是实力政治，也是价值政治。其次，这些著作所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建构国际体系、国际社会以及世界社会。围绕这些核心问题，不同学者分别从逻辑推演、历史分析角度进行了论证。这些都是大问题，需要大视野、大答案。这对于我们思考目前日益全球化的世界，非常具有启发意义。最后，这些著作在国外学术界乃至教学中，都具有良好的声誉。有的书已经再版多次，并且成为所在领域的权威性著作。借助这些书，我们可以更及时地了解国外国际政治理论的发展。

选译是一件痛苦而充满期待的工作。本套书从组织翻译到校译统稿，历经四年之久。译者有的已经离开北京到外地工作，有的到海外留学深造。翻译过程中也经历了多次反复，一些译者用很多时间与作者就具体的问题进行沟通交流，丛书编辑为了统稿校对花费了大量精力。令人欣慰的是，这些努力终于换来了沁人的书香。

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特别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大国的崛起，国际政治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则是现在的历史”。我们希望这些著作能为我们理解当前的国际政治提供历史和理论的借鉴，也希望我国的国际政治研究也能为人类文明作出自己的贡献。

| 目 录 |

导 论	/ 1
第一章 个人安全与国家安全	/ 36
作为一种社会问题的个人安全	/ 37
个人安全与国家的两面性	/ 40
作为一种威胁来源的国家	/ 45
结语：个人安全与国家安全	/ 52
第二章 国家安全与国家性质	/ 58
作为一种安全对象的国家	/ 58
国家观念	/ 72
国家制度	/ 87
国家的物质基础	/ 95
结语：强国家与弱国家	/ 101
第三章 国家不安全：威胁与脆弱性	/ 114
威胁与脆弱性	/ 114
不同领域中的威胁类型	/ 119

威胁的识别	/ 136
结语：威胁的模糊性	/ 142
第四章 安全与国际政治体系	/ 145
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性质	/ 145
国家的特征	/ 153
体系结构在安全分析中的效用与限度	/ 161
国际社会	/ 169
结语：无政府状态与安全	/ 178
第五章 地区安全	/ 186
国家与体系之间：安全复合体	/ 187
地区安全简史	/ 204
作为结构的安全复合体：变化的进程与后果	/ 211
结语：安全复合体和政策分析	/ 221
第六章 经济安全	/ 227
国际政治经济的本质	/ 227
经济安全的概念	/ 232
经济安全与国家	/ 239
经济安全与国际体系	/ 246
结语：展望一个成熟的无政府政治经济体系	/ 257
第七章 防御困境	/ 262
防御困境的界定	/ 264
防御困境的历史进程	/ 268
防御困境的持久性	/ 277

结语：防御困境和安全	/ 280
第八章 实力—安全困境	/ 283
权力斗争和安全斗争	/ 283
修正主义国家与维持现状国家	/ 288
修正主义的本质	/ 293
军事因素	/ 301
结语：实力—安全困境可以化解吗？	/ 309
第九章 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政策问题	/ 314
逻辑问题	/ 316
认知问题	/ 327
政治问题	/ 332
结语：作为国家安全问题一部分的决策	/ 338
第十章 国际安全研究总论	/ 344
概述：安全研究议程表	/ 344
宽泛安全研究议程的理由及其后果	/ 348
政策意义	/ 353
译者后记	/ 360

导 论

国际关系中的国家安全问题

安全——无论是个人安全、国家安全还是国际安全——是人类面临的最突出问题之一，很少有人会否认这一点。其中，国家安全更是居于核心地位，这不仅因为国家控制了许多要件，而这些要件决定了其他两个层次的安全问题，还因为国家看起来似乎不能彼此和谐共处。自从国家出现后，其他国家的存在往往就是一国不安全的根源。在追求自身安全的过程中，一国的军事和经济行为总是与其他国家的类似行为交织在一起，进而导致经济混乱和战争频发。随着时间的变迁，国家安全问题的强度和特点也迥然各异——在一个时期，对抗或许无处不在；而在另一个时期，紧张关系不仅得到了缓解，而且还会出现合作上升的势头（典型的例子就是 19 世纪和现在）。尽管如此，根本性的问题却依然存在，它带来的不确定性和恐惧一刻也没有消失过。

我们只有首先搞清楚“安全”的定义才能准确理解国家安全问题。然而，在“安全”的大多数用法中，尤其在那些国家决策者口

中,对这个概念本身的分析相当匮乏;相对于我的研究目的而言,这些用法既肤浅又粗糙。我将表明,缺乏对“安全”概念的深入分析将会给我们的进步造成多大的障碍,以至于我们甚至可以将其视为问题的一部分。在我看来,那些缺乏深入分析的“安全”概念既没能搞清楚这个概念本身所内含的种种矛盾,也对这样的一个事实不甚明了,即安全逻辑(the logic of security)总是意味着寻求安全的行为体之间存在着较高度度的相互依存。我将表明,一个经过深入分析的安全概念将如何为我们重新界定国家安全问题提供便利。

“安全”概念并不是研究国家安全问题的唯一路径。一直以来,在那些试图分析国家安全问题或试图为其提出解决方案的文献中,绝大多数都基于权力(power)与和平概念之上。时至今日,这种做法依然屡见不鲜。对“权力”概念偏爱有加的那些人,其思想源自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学派,后者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爱德华·卡尔和汉斯·摩根索。^① 权力不仅反映了国际体系中基本的实力结构,而且彰显了行为体的一个首要动机。这一点需要进行深入探究。那些更偏爱“和平”概念的人,大致可以被归入理想主义学派之中。理想主义者认为,“和平”概念不仅有利于对安全问题进行历史性审视(与现实主义者的片面观点相对应),而且它还能将人们的注意力直接集中到“战争”这个核心话题上。既然战争是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则那些旨在解决战争问题的方案将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国家安全问题。

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这两种方法一直在有关国家安全问题的思考中居于支配地位。在我看来,这两种方法经常会导致高度绝对化和

^① E. H. Carr,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London, Macmillan, 1946, 2nd edn; Hans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New York: Knopf, 1973, 5th edn. 也可参见新现实主义的观点,见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9. 这里所指的“现实主义”不应与哲学中的“现实主义学派”相混淆。

冲突性的解决方案，对于这一点，我在其他地方已有详尽论述。^① 在相关的辩论中，“安全”概念总是扮演了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现实主义者倾向于将安全视为权力的衍生物：拥有足够实力并占据主导地位的行为体自然将获得安全。当权力以摩根索那种十分宽泛的方式界定时^②，那么这种观点是很容易得出的。尽管它正确地将安全视为一个目标，但是这种观点（即将权力视为获得安全的途径的观点）却具有内在的自挫性质。理想主义者倾向于将安全视为和平的结果：持久的和平将为所有国家带来安全。

在本书中，我将表明，同“权力”与“和平”概念相比，“安全”概念本身是研究国际关系更为有效的工具——它更具弹性和渗透力。“安全”概念指出了行为的一个首要动机，尽管与“权力”概念赋予行为体的动机不同，但却同样重要；它也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视角，尽管与“和平”概念所提供的视角迥异，但却同样有效。总之，它将为我们提供一个分析框架，它可以与已有概念所提供的所有优势相媲美。经过充分探究的安全概念可以被视为“权力”与“和平”之间的中间地带：它吸收了后两个概念的大部分长处，但更多地将自身优势融入其中。它提出的许多理念将其他两个学派各自的论点联系在了一起，进而超越了存在于它们之间的政治鸿沟和思想鸿沟——正是这些鸿沟将它们分裂开来，并给彼此造成了消极的影响。

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对“安全”概念进行深入挖掘——这并不是要恢复“安全”概念的本来面貌，因为它从来就没有被深入分析过。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早期开始，这方面的工作业已有序展开，但为什么人们长期以来对“安全”概念一直没作深入分析呢？我想，以对这个问

① Barry Buzan, 'Peace, power, and security: contending concepts i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al relation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21: 2 (1984).

② Peter Gellman, 'Hans J. Morgenthau and the legacy of political realism',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4: 4 (1988), pp. 50-8.

题的考察作为我们讨论的开始是很有意义的。

安全：一个未被深入分析的概念

作为国际关系领域中的一个概念，“安全”一直未能被深入分析，这首先体现在相关文献对它的用法上。论述权力的相关文献中不仅汇集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它还包括一个自成体系的理论架构。对于那些被广为使用的学术概念，人们总是希望能够在不同用法中找到相同点。但是直到最近，这种做法却不适用于“安全”概念。

无论是在国际关系还是其他学科中，“安全”这个词本身被学者们广为使用。无论是实践者还是学者，似乎都认为它是一个核心概念。但是相关的文献却是极不平衡的。实证研究方面的文献浩如烟海，它们关注的是现今的国家安全问题和议题。这其中的大部分出自战略研究这个子领域，对于后者而言，安全是一个核心的规范概念。无论是国家的外交、军事和经济政策，还是那些充斥着变化和争论的政策交叉领域，以及国家建构的一般关系结构，都可以通过国家对国家安全和（或）国际安全的追寻来进行分析。除了代表特定行为体的政策偏好外，“安全”概念很少被赋予其他的含义。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经济和环境问题日益凸显时，这种状况才略有改观；即使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末，对“安全”概念的争论仍旧带有浓厚的“军事中心”色彩。

当你试图查询一些关于安全概念的文献时，你会发现，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的相关文献相对较少，也没有一脉相承的思想流派。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对集体安全的热情显示了向这个方向发展的迹象，但是国联和联合国——这两个借以实现集体安全理想的机构——

的失败使人们对这套方法的热情不再。^① 约翰·赫兹 (John Herz) 在 50 年代早期提出的“安全困境”概念或许可以被视为一大突破。^② 安全困境是一个结构性概念, 它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 即国家追求自身安全的自助行为, 无论其意图怎样, 都会导致其他国家日益不安全, 因为每个国家都认为自身追求安全的行为是防御性的, 而其他国家的相应行为则被它们视为潜在的威胁。在相关文献中, 安全困境理念深得学者们的认可, 但是实践表明, 冷战这个大环境无法为这样一颗自由的种子提供合适的土壤: 它将大多数人的视野限制在敌对国家间的行动—反应机制上。直到 70 年代末, 学者们才重新将注意力投向安全关系中的无目的性和相互依存的要素, 罗伯特·杰维斯的著作就是最好的体现。^③ 作为阐释国际政治运行机理的一种方式, 这种理念提供了一种不同于权力斗争的模式。这种模式既自成体系又有很强的解释力, 这真是令人吃惊。

对安全概念最有名的界定或许就源自阿诺德·沃尔弗斯 (Arnold Wolfers) 那篇关于国家安全的论文。^④ 沃尔弗斯对国家安全的强调无

① 参见 Otto Pick and Julian Critchey, *Collective Security* (London: Macmillan, 1974); Roland N. Stromberg, *Collective Security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Praeger, 1963); M. V. Naidu, *Collective Security and the United Nations* (Delhi: Macmillan, 1974); and Barry Buzan, 'Common security, non-provocative defence, and the future of Western Europ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3: 4 (1987), pp. 265-7.

② John H. Herz, 'Idealist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2 (1950), pp. 1-25; John H. Herz, *Political Realism and Political Ideal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1); and John H. Herz,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Atomic Ag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pp. 231-43.

③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esp. ch. 3; 'Security regi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6: 2 (1982) and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30: 2 (1987), pp. 167-214. 另见 Richard K. Ashle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ar and Peace: The Sino-Soviet-American triangle and the modern security problematique* (London: Pinter, 1980).

④ Arnold Wolfers, 'National security as an ambiguous symbol', *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 7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2), ch. 10.

疑反映了实证研究中的主导倾向，他的论文对“安全”概念的多维性进行了出色的阐释。他将安全看做是一个“模糊的符号”——有时候他甚至认为安全“或许根本就没有任何确切含义”，这种看法似乎挫伤了一些人的积极性，后者试图将安全作为理解国家关系的主要路径。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绝不是沃尔弗斯本意，因为他这篇文章的首要目的在于揭示模糊的安全概念带来的潜在危害——作为一种国家符号，“安全”概念蕴涵了极大的政治影响力。

除了这些核心著述外，80年代之前对安全概念的讨论并不多。一些学者对安全概念运用中的困难进行了简要而不失意义的阐释，比如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伯纳德·布罗迪（Bernard Brodie）、弗兰克·特雷格（Frank Trager）和弗兰克·西蒙尼（Frank Simonie）。^① 休·麦克唐纳（Hugh Macdonald）试图解决安全概念的模糊性问题，但其对安全的分类却自相矛盾，最终他只能以安全是个“不充分”的概念为由为自己打圆场——汉斯·莫瑞森也认为安全是个不充分的概念，尽管其推论依据与麦克唐纳大相径庭。^② 罗伯特·杰维斯提出了安全机制（security regime）的概念，这将学者们的分析视角从国家层次转到了体系层次。^③ 哥特·克莱尔（Gert Krell）试图从和平研究的视角对过分侧重军事因素的安全概念予以广泛批判。^④ 至少从表面上看，我们会发现，对于安全的一般讨论都是在美国政策选择的背景下

① Hedley Bull, *The Control of the Arms Race*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61), pp. 25-9; Bernard Brodie, *War and Politics* (London: Cassell, 1973), ch. 8; Frank N. Trager and Frank L. Simoni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national security', in F. N. Trager and P. S. Kroenberg (eds), *National Security and American Society*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73).

② Hugh Macdonald, 'The place of strategy and the idea of security', *Millennium*, 10: 3 (1981); Hans Mouritzen, *Finlandization: Towards a general theory of adaptive politics* (Aldershot: Avebury, 1988), pp. 46-7.

③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④ Gert Krell,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 of security', *Arbeitspapier 3/1979*,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Frankfurt.

展开的。^① 在那些数量庞大且久负盛名的批判战略研究的文献中，也包含了一些与安全概念的用法相关的评论。^② 这些论述，尽管各有各的长处，但都没能开启对安全概念进行系统分析的先河。赫兹、杰维斯和布尔的作品至多为特定问题的分析提供了有洞见的方法，但是它们都无法触及安全概念潜在的意义——透过安全概念，我们可以洞悉整个国际关系学。

作为一个拥有政治影响力的概念，安全概念很少为人们所深究。对于这种状况所隐含的危险，人们并非一无所知。人们很容易（尽管并非必定）将安全理解为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对安全概念的这种理解被一些学者批评为“太过狭隘和空洞”。上面提到的沃尔弗斯的那篇文章完成于冷战的高潮时期，在文中，沃尔弗斯就对狭隘而空洞的安全概念提出了批评。理查德·阿什利（Richard Ashley）对那些狭隘的安全研究方法进行了抨击，认为它们是以行为体为中心的还原主义（他称之为“技术理性”）。他呼吁对安全的研究应采取整体性的、以联系为中心的系统方法——或称“适当理性”（*rationality proper*）。^③ 在阿什利看来，技术理性本身就是加深安全困境的罪魁祸首。肯·布思（Ken Booth）令人信服地指出，基于国家和民族界限之上的战略研究，不仅对于探究安全问题的特征而言是不充分的，而且还会造成危险的后果——它得出的片面结论一旦成为国家的政策，就会使问题变得更糟。尽管他们的出发点迥然各异，但阿什利和布思却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正如布思所言，“那些战略研究者们从未试图为安全问题的解决

① 例如，Richard J. Barnett, 'The illusion of security', in Charles R. Beitz and Theodore Herman (eds), *Peace and War* (San Francisco: W. H. Freeman, 1973); and Maxwell D. Taylor, 'The legitimate claims of national security', *Foreign Affairs*, 52: 3 (1974)。

② 参见 Barry Buzan, *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ic Studies: Military technolog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Macmillan, 1987), pp. 12-13。

③ Ashle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ar and Peace: The Sino-American-triangle and the modern security problematique*, esp ch. 10.

提供什么真知灼见，相反，他们却日益成为问题恶化的原因之一，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①

莱昂纳德·比顿 (Leonard Beaton) 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他指出，安全概念的外延不应局限于国家安全，它应向外延伸，将一些体系性因素囊括进来。^② 尽管研究视角各不相同，但斯坦利·霍夫曼 (Stanley Hoffmann) 也持有相似看法。他认为，我们必须将“国家安全转变成世界秩序政策的一个方面”。^③ 亨得利·布尔反对在国家安全研究中过分强调国家的自我利益，他认为国家安全的共同性和不可分割性应该得到人们更多的关注。^④ L. B. 克劳斯 (Krause) 和约瑟夫·奈 (Joseph Nye) 在更宽泛的意义上指出，“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政治学家，他们都没有充分意识到安全概念的复杂性，也没有意识到它对提升其他价值所起的工具性作用。”^⑤ 勃兰特委员会 (Brandt Commission) 呼吁提出新的安全概念。在他们看来，新的安全概念要超越狭隘的军事防御范畴，并与更宽泛的相互依存逻辑相契合。^⑥

在上述这些观点背后，表达了这样一种共同的关注，即以单个国家为中心、以军事问题为主要内容的安全概念存有内在缺陷。最好的结果，是这种安全概念导致将安全等同于一个危险而模糊的符号。对于这一点，沃尔弗斯进行了很好的阐述。他指出，“从表面上看，它（即这种安全概念）似乎为广泛共识的达成提供了指导和基础……但

① Ken Booth, *Strategy and Ethnocentrism* (London: Croom Helm, 1979), p. 133.

② Leonard Beaton, *The Reform of Power: A proposal for a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72) .

③ Stanley Hoffmann, *Primacy or World Order* (New York: McGraw-Hill, 1978), p. 252.

④ Bull, *The Control of the Arms Race*, pp. 28-9.

⑤ L. B. Krause and J. S. Nye, 'Reflections on the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ganizations', in C. F. Bergsten and L. B. Krause (eds), *World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75), p. 329. (黑体文字为原文如此。)

⑥ *North-South: A programme for survival*, Report of the Brandt Commission (London: Pan, 1980) pp. 124-5.

它或许也会导致这样一种结果，即每个人都为其所偏好的政策贴上一个引人注目、但很可能极具欺骗性的标签。”^① 最坏的结果，是它导致安全困境达到相当的烈度，在那些将国际关系视做无休止的权力斗争的人看来，这简直就是他们心中模式的翻版。他们认为，“国家安全”或许具有内在的自控性质，甚至于“国家”和“安全”两个词本身就是矛盾的。

由于决策者和战略研究者主要通过国家实力判断一国的安全状况，这就导致了一种毫无裨益的“雷同”主导了人们的安全观。学术界中最关注安全问题的学者们，其思维大都深陷于“权力安全观”之中不能自拔。出于其地位以及权力和职责的要求，国家决策者们主要是在国家的层面上看待安全问题的，过去如此，现在亦然。在超国家层面上几乎没有真正自主的决策者。因而，这样一种南辕北辙的现象就蔚然成风，即政策和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将安全推到相反的方向上去：那些主要行为体——无论是学者还是政策实施者——都深陷其职责之中不能自拔，而经过制度化传统的长期熏陶，他们对各自职责的看法早已根深蒂固。

尽管在实证层面上时常会冒出一些争论，但它们通常都缺乏对安全概念的全面深入理解。因而，长期以来一直缺乏对安全概念的深入思考。究其原因，至少存在五种不同的解释方式：

第一个可能的原因出于这样一种简单的看法，即安全概念太过复杂，因而研究者们都知难而退，转而去分析那些相对较容易应付的概念了。这种说法有些许道理，因为安全（正如你们将在本书中所看到的）实在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但是它并不比社会科学中的其他核心概念更为复杂。诸如权力、正义、和平、平等、爱情和自由这样的概念

^① Arnold Wolfers, 'National security as an ambiguous symbol', *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 7 (Baltimore: Johns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147.